

清末东北移民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李宗双^{1,2} 范立君³

(1. 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四平 136000;

2. 通化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通化 134000; 3. 吉林大学 文学院, 吉林·长春 130012)

摘要: 1860年东北开禁后, 移民大规模的涌入, 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开发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入东北的移民与土著在互嵌式居住、生产互助、婚姻习俗、文化互鉴、民俗信仰等领域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增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感基础与物质基础, 为民族团结、文化认同、地区发展营造一个具有参考性的历史演进与框架结构, 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 清末; 东北移民;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59 (2024) 02-0148-08

DOI编号: 10.13965/j.cnki.gzmzyj10026959.2024.02.021

The Migr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thnic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LI Zong-shuang^{1,2} FAN Li-jun³

(1.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Jilin 136000, China;

2. Marxism Institute, Tonghua Normal University, Tonghua, Jilin 134000, China;

3. School of Literature,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lifting of the ban in Northeast China in 1860, a large influx of immigrant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and ethnic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Immigrants entering Northeast China and indigenous people had extensive, comprehensive, and deep interactions in areas such as inter-ethnic living, production cooperation, marriage customs, cultural mutual learning, and ethnic beliefs, enhancing the emotional and material foundation of ethnic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This outlined a referential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framework for ethnic unity, cultural identit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furthe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Immigr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Ethnic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收稿日期: 2024-02-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以来东北移民史资料整理与研究(1644-1945)”(项目编号: 17ZDA19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 李宗双,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通化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东北边疆史; 范立君, 博士, 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中国近代史、东北边疆史。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伟大祖国的历史^[1]。清代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时期。在清代东北的历史嬗变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其重要的历史逻辑与发展特点。近年来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多注重于对其学理、内涵、逻辑的考证，缺乏对边疆民族地区移民史料与方志史料的深入挖掘^{[2]P74}。清末东北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成果显著，值得予以关注与研究。清末东北移民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这一历程不仅伴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演进，而且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实体形式，进一步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展过程。

一、清末东北移民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逻辑起点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逻辑起点是“三交”史研究的起始范畴，往往以民族融合的起始形式与内容来表现。它是清末东北地区各民族交往融合的基本单位，其研究背景、研究对象、理论内涵等贯穿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的全过程。通过对清末东北地区移民政策的概述与移民迁入动因的分析及移民路线选择的回顾与总结，有助于全面了解清末东北地区民族交往融合的前期状况，形成科学完整的“三交”史研究理论体系与研究视域。

（一）清末东北封禁政策的变迁

东北地区是清朝的“肇迹兴王之所”，一直备受清廷关注。封禁政策是清廷的一项基本国策，对稳定东北的社会秩序与清廷的后方根据地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东北地区的人口封禁范围广泛，形式多样，呈现多元化特点。弛禁范围以图们江以北、盛京以东、伊通以南为主，不同时代略有不同，其形式包括关禁、海禁、边禁、围禁等。清代东北封禁政策的变化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进程。康熙六年（1667）至乾隆四年（1739），清廷局部封禁辽东与关外地区。乾隆五年（1740）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廷全面封禁辽东与关外地区。乾隆五十七年（1792）至咸丰十年（1860），清廷对东北腹地禁中有弛。咸丰十年（1860）至宣统三年（1911），清廷对东北由局部开禁到全面开放。晚清时期沙俄入侵边陲危机，流民私垦、

盗采现象十分严重，封禁政策已经无法阻挡人口北移西徙的趋势。

同治元年（1862），清廷发布上谕，清丈流民私垦土地，“凡自种黑地业户……俱各查明段落四至，勘丈属实，照例升科，由户部颁给执照，准其永远为业”^{[3]P111}。此次上谕的发布表明了清廷对流民私垦土地的让步，预示着东北封禁政策的松弛与移民实边的开端。光绪四年（1878），光绪时期改变了东北的封禁政策，通过设立垦务局的方式，鼓励关内汉人移民开垦，并提供相关的政策支持。与此同时，移民的救济问题是刻不容缓的，不可不急救解决者也^{[4]P123}。光绪六年（1880），清政府通过垦荒、免税、资助三类措施，鼓励关内人口迁移东北。这一举措为后续东北地区的开放提供了政策依据。

随着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地闲荒的开垦，移民群体大量涌入东北地区。一时间，“由奉天至吉林之日，逆旅所共寢室者皆山东移民”^{[5]P57}。宣统三年（1911），东三省总人口为1841万人，“其中约1000万人是由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先后迁徙的流民，其中山东移民人数最多，约在七百万人以上”^{[6]P20}。据此可知，清廷封禁政策的调整从政策的施行方面打破了原有的封禁限制，保障了移民路途的通畅，大量关内移民涌入东北地区。近代以来，自山东、河北、河南等省的流民，因饥馑、灾荒而逃荒就食者不计其数，“每年春夏两季，相率于道，络绎不绝^{[7]P49}”。由此可知，晚清关内人口流动频繁，逐渐形成一种社会潮流。清末关内人口向资源相对丰富的东北地区迁移是人口流动的自然现象，并不是清廷封禁政令所能阻挡的。

（二）移民迁入的动因与路线

1. 移民迁入的动因

地理空间环境是影响移民迁入的重要因素。根据《满洲考略》《满洲地志》《满洲旅行记》的记载：初土壤甚广，东西相距三千余里，南北三千二百余里，东尽大海，南界朝鲜渤海，西界内外蒙古，北逾外兴安岭，与俄属西伯利亚地犬牙相错。东北地区自南向北跨越中温带与亚寒带，属于温带半湿润半干旱的季风气候，地处高纬度地区，冬季寒冷漫长，气候干燥，夏季短暂，温湿多雨。其于山岳也，则有森林矿物禽兽药品。

其于江河也，则有鱼鳖。其于原野也，则有谷类、豆类、菜类、瓜类^[8](P30-31)]。由此可知，清代东北地区地域辽阔，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区域内主要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其地形特点为三面环山平原中开，属于商品谷物地域类型。清代东北地区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地广人稀，适宜人口生存繁衍。

政治经济要素是影响移民迁入的重要因素。清末复杂的社会危机促进了封建社会性质的变革，其中内因（社会危机）与外因（外部侵略）是最为重要的考察因素，内因与外因的变化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状态。政治上，清廷由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向帝国主义影响下的复合政治制度过渡。咸丰十年（1860）至宣统三年（1911）间清廷社会危机加剧，内部兵燹时起，匪患严重，外部日俄虎视边防空虚。经济上，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央财政空虚，割地赔款内忧外患。1858年俄国逼迫清政府签订《璦琿条约》、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1864年，营口港被迫开放，欧美的廉价商品逐渐涌入东北地区，对清廷的弛禁政策产生深刻影响，加速了中国传统经济模式与社会性质的转变。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双重影响导致关内人口大量北徙。根据《荣城县志》记载：关内地瘠民贫，百倍勤苦，所获不及下农，拙于营生，岁歉则轻去其乡，奔走京师辽东塞北，柳边已成虚设，清查之令已成具文……各地遇饥谨之年，贫民车载报负，实系觅食灾民，只须问明来历以备稽查，毋得概行拦截^[9](P72)]。综合分析这段史料可知，清廷虽采取严格的封禁政策阻止流民出关，但结果却没能实现禁止流民迁徙的目的。

土地所有制的流变是影响移民迁入的重要因素。入关前旗人原为牧猎民族，奉行“国语骑射”不善于农垦耕种。入关后皇太极为适应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谕令八旗兵丁分旗占有土地，随即清初的兵丁占有转为旗地公有。与此同时，旗人、旗地原属于国家所有，不允许旗民交产，买卖土地，清初规定土地归国家所有。清朝为解决旗人生计问题，按旗别、宗族、爵位等，由内务府按规定配给相应房产、份地、奴仆。对于旗地而言，旗人只是具有土地的使用权，而非土地的所有权，但入关后清廷规定由国家供养旗人生计，加之旗人人口剧增，管理混乱、骄奢淫逸等问题，

导致旗民交产与土地兼并问题时有发生。清中叶以降，清廷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旗民交产的合法性，但旗民交产的发展并没有阻止晚清土地兼并的趋势。清代的经济模式是以传统的农业经济为导向的，其生产关系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普通劳动生产。其中，劳动方式主要是依靠农业、畜牧业及传统手工业等自给自足的物质生产方式。传统的生产方式技术形式落后，商品种类单一，经济关系松散，加之晚清土地兼并的加剧，导致部分民人和自耕农不断丧失土地或沦为了土地所有者的短期雇农，甚至直接破产不得不流亡他乡。综上所述，流民因土地问题迁移者众多，成为移民迁徙的重要因素。

2. 移民迁入的路线

首先，以陆路为主的路线选择。移民群体在路线的选择上多以喜峰口、古北口为出发地，越过柳条边进入科尔沁、郭尔罗斯、杜尔伯特、盛京等地。来自关内的移民，通常需要经过柳条边与卡伦的双重阻碍，才能进入盛京地区。虽然乾隆时期以“到关验票、有无家眷”等措施限制关内人口流出，但收效甚微。从乾隆十二年（1747）至咸丰十年（1860）之间，流入东北的人口增长迅速，曾封禁200余年的东北地区，由于流民的大规模涌入而被迫开放，这也恰好说明了关内移民融入东北社会的真实状况。其次，以海路为主的路线选择。传统的陆路经山海关进入辽东地区的路线，已经不能满足移民的迁徙需求。因此，泛海偷渡、越山密潜的途径成为关内移民的多种选择。关内移民跨过渤海海峡渡海而至，由于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距离较近，且具有漫长的海岸线，清政府虽多次采取查禁措施，但效果十分有限，关内移民通过海路躲避盘查，最终进入东北地区。清代柳条边沿线曾设置21个边门，以加强对东北的封禁与流民的管理。清末关内移民多经盛京“老边”涌入“新边”，最终进入东北腹地。

清末东北地区的移民受封禁政策、自然灾害、兵燹与侵略的影响，经陆路、海路、边门、柳条边等先后涌入东北地区，迁入的流寓人口与土著在合作与竞争中，逐步展现出各民族早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状况。

二、清末东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维表现

清末东北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贯穿于互嵌

式居住、生产互助、婚姻习俗、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的不同方面，展现为民族融合对近代东北地区的具体影响。随着清末东北地区各民族交往融合的深入，移民与土著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呈现出一种新的变化。清末东北地区在各民族的交往融合中传统的制约因素被打破，新兴的因素在成长，民族融合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彰显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厚重与辉煌。

（一）移民与土著的互嵌式居住见证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状况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涉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也涉及个人与群体以及不同民族群体交往融合的关系，是个人身份认同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中移民与土著的互嵌式居住见证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清代东北的土著人口包含满族、汉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锡伯族、朝鲜族、卦尔察族在内的多民族群体”^{[10](P100)}。其构成与分布大致包括以下四部分。第一，辽宁东部、吉林西南部的满族人口。满族从西周的肃慎、汉朝的挹娄、南北朝的勿吉、隋唐的靺鞨、宋元的女真、再到明朝的女真，满族为东北地区主要的土著人口。第二，黑龙江南部、辽宁东部与吉林中部的汉族人口。根据《明史·地理志》中的相关记载：明代东北地区由左军都督府及后军都督府管辖，并由各自属地的都指挥使司设置“卫所”与驿站，用以统计属地范围及核定人口。隆庆时期，通过对辽东镇、辽左、辽河套地区的人口统计，各民族群体约130万人口以上，其中汉族90万左右。第三，吉林西部与黑龙江西南部的蒙古族人口。根据《清朝文录简编》的相关记载：“蒙古国人六万，已归附五万”^{[11](P46)}。这五万人成为东北地区主要的蒙古族土著人口。第四，黑龙江中部与北部的少数民族人口，主要包括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赫哲等少数民族。由此可知，以上简要介绍的各民族分布情况构成了东北地区基础的土著人口。

1860—1911年，随着清末社会危机的加剧与移民的大规模涌入，“进入东北地区的人口在1775—1899年间，人口谷值是895071，峰值是7605588，波幅是6710517。1900—1911年间，东北人口谷值12000000，峰值是19964226，波幅7964226”^{[12](P61)}。

从人口数据可知，近代以来，移民大量涌入东北地区，在互嵌式居住中逐渐成为东北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东北地区的人口构成主要包括旗人与民人，但无论是旗人还是民人均不是单一的民族构成，他们是一个包含多民族人口的共同体。清末的移民与土著混居于三江平原、松嫩平原、辽河平原等人口稠密区，他们穿梭于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等地采樵、耕种、渔猎等。清末东北移民数量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移民与土著的交流互动，移民与移民的后裔经过若干代际的衍生，逐渐成为区域民族人口的主要构成，从而加速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这种民族融合伴随着人口数量、祖籍认同、民族认同、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深化，清末东北的移民与土著通过互嵌式居住、经贸合作、民族交往、文化交流互鉴等形式，妥善处理了民族交往中的各类关系，由早期的冲突斗争转变为后期的协作发展，各民族的社会结构也随之由血缘宗族转变为地缘伙伴，逐渐完成了社会结构的初期转型，并在移民与土著的互嵌式居住中，展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状况。

（二）生产方式与婚姻习俗的变化见证了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过程

清末随着清廷行政体制的变化，原本旗民二元的管理体制逐渐弱化，各民族相对单一的生产方式逐渐转向多元化。咸丰十年（1860），大量关内流民涌入东北地区，流民在平原地区大力发展种植业。同治以降，清廷在裁准荒地后将荒地减收地价划归民有，来自关内的流民开始了新一轮的垦殖（包括对旗地、官庄的耕种）与开发，逐渐形成农耕经济带。咸丰二年（1852），流民以租佃之名行开荒之实，逐渐摆脱了对土地的人身依附，成为新兴租佃关系下的佣工，甚至将部分旗地及官荒转化为民地。同治以后，东北地区的流民逐渐完成了佣工身份的转变，其与土著的交往交流也日趋密切。清末虽然蒙古族及部分流民在内蒙古东部高原地区发展畜牧业，形成畜牧业经济带，但是以索伦、鄂温克、达斡尔、赫哲为主的少数民族群体，仍在东北北部外兴安岭南部地区与汉族、朝鲜族人口交换猎物，发展贸易互通有无。加之晚清东北移民群体的大量涌入，传统的生产方式由单一的种植业、畜牧业向养殖业、

渔猎等多元化生产方式转变,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与劳动方式的革新。

各民族人口的婚姻状况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清末东北的土著人口出于保持本民族血脉纯正与承袭正统的目的倡导族内通婚,但是明确反对“血亲婚”。清末随着社会危机的加剧与封建经济的解体,各民族交往日益密切,不仅满汉可以通婚,而且清政府在同治三年(1864)规定,旗人与民人可以自由结亲,用来缓解旗民生计恶化、旗人无处安插等社会问题。自此东北地区一改满汉、蒙汉不结亲的谬见,各民族人口嫁娶汉族、蒙古者众多。如达斡尔、索伦相互联姻或与蒙古通婚。“营、站、台、屯,则满洲、汉军娶其女者有之”^{[13](P12)}。据此可知,婚姻作为民族交往的重要媒介,清末满族、汉族都存在与蒙古族通婚的现象,达斡尔人与索伦人、鄂伦春人也出现了通婚现象,这表明清末的联姻与通婚,直接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流动与融合。综上所述,清末各民族交往融合日益频繁,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各民族在地域、民族、语言、风俗等方面的差异,促进了各民族混居共处、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格局的形成。

(三)民俗信仰与语言文字的变迁见证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关系

民俗信仰的变迁见证了清末东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清代东北地区的宗教信仰主要包括佛教、基督教、萨满教、伊斯兰教、道教等。近代以来除了传统的萨满信仰外,黑龙江、盛京、吉林等地的庙宇设置与关内汉俗既有相近之处,也存在一定差异。如盛京地区寺庙的兴建,盛京相较于黑龙江、吉林两地庙宇很多,尤其是乾隆以来关内移民的大量涌入,移民在获得土地的同时,逐渐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随即着手修复或新建一些寺庙,以缅怀或重建自身的精神信仰。又如吉林境内的山神崇拜,主要表现为对“自然神、动物神、植物神”的信奉。根据弗·克·阿尔谢尼耶夫《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中的相关记载:“森林中常有土著和流民兴建的以动物神、自然神为主的小型山神庙”^{[14](P72)}。根据《满族的入关与汉化》中关于宁古塔、奉天、吉林地区39种不同庙宇与信仰形式的统计分析,可知清末东北地区各民族宗教信仰融合变迁的真实状况。

晚清随着移民大规模涌入东北境内,移民群体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和租赁权后,常常将祖籍地信仰带入迁入地,通过家族祭祀、民俗信仰等形式留存于社会精神生活中,当人口比例、经济发展、民族交往等社会条件逐步成熟后,移民群体会积极主动地将民俗信仰转化为对庙宇实体的兴建。晚清东北地区的流移人口逐渐摆脱了具有明显祖籍地色彩的神明祭祀,转而形成本土化(跨祖籍地)神明祭祀的现象。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与语言连理同枝相互影响。满语反映了满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它不仅沉淀在沟通交往方面,而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满语曾长期作为清朝的“国语”,推崇满语是清廷在东北地区维护“国语骑射”与后方根据地的重要举措。嘉庆以后,东北地区使用满语的人越来越少,满语逐渐走向衰落。光绪十年(1884),清朝使用满语的人数约四万人,且呈逐年递减的趋势,至19世纪末满语逐渐被汉语所代替。满语由入关时统治者的大力推崇,到清后期的逐步衰微,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进程,受到环境、政策、文化教育、民族交往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具体而言:第一,受到清代东北地区宽松语言环境的影响,历代统治者虽然很重视对满语的推崇与保护,但是出于朝堂交流、民间交往的需要,并不强制汉人学习满语。语言政策与环境的宽松,进一步放大了汉语、蒙语、汉语方言等语言的优势,使得满语的传播陷入困境。第二,清廷入关后为维护政权统治,弱化满汉对立,鼓励满汉通婚,甚至要求皇族、旗人等适当掌握一定的汉语言与文化,逐渐开始了“汉化”的历史进程。第三,满语的衰微受到满族人口数量减少、民族交往的扩大、满语考核形式化、兵燹与侵略等因素的影响,晚清满语进一步衰微。简言之,晚清随着各民族交往融合深入,移民通过人口基数的优势,加快了对汉语的推广,进一步促进了社会通用语言的发展。

三、清末东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意义

清末东北各民族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中,巩固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物质基础,开创了民族团结进步的新局面,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长期的民族交流中,增进了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在长期的民族交融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的格局，共同推动了东北地区的全面发展。

(一) 民族交往是东北各民族团结互助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

民族交往是清末东北地区各民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下所进行的一种互动形式，这种交往形式将不同民族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得各民族在情感、观念、理想、文化等方面形成一定共识，成为促进东北各民族团结互助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所在。

1860年以来移民大规模涌入东北地区，移民与土著交往日益密切，各民族通过互嵌式居住、文化交流互鉴、民俗信仰融合等形式的交往，实现了移民与土著、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良性沟通。东北地区的民族构成复杂、民族来源广泛，但从文化记忆来看却具有明显的同一性，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从部落到国家的秩序建构中，经历的社会变迁与地域变迁中所留存于政治制度、经济形态、刑罚体系中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是对5000多年中华文明历史的回溯，又是各民族交往融合的重要见证。总之，清末在民族交往中所确立的共同性意识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思想延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民族交往体现在东北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民间信仰等内容中，并逐步将共同体意识融入民族交往的价值认同中，在整合各民族价值差异的同时培育出各民族间团结互助的价值取向。清末移民与土著通过资源与信息共享，增进了各民族间的情感认同，形成了一种良性的社会交往氛围。清末东北地区的移民与土著受近代社会危机与移民浪潮的影响，具有较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意识。在清末东北地区的发展中，移民与土著所表现出的家国情怀彰显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特征。

(二) 民族交流是增进东北各民族文化认同的桥梁与纽带

文化认同是衡量清末东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指标，文化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它是各民族长期创造而形成的，承载着各民族的理想信念、精神寄托、心理归宿。民族交流对东北地区的移民与土著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在清末各民族的文化交流

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兼爱包容”等价值共识，成为东北地区民族交往、人文交流、道德教化的重要依据。

清末东北地区人口分布的特点是“大杂居，小分散”，土著与移民主要分布在三江平原、松嫩平原、辽河平原等人口稠密地带。受东北地区独特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影响，移民迁徙到新的居住地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交互与竞争中，谋求着个体生存的需要。同时，迁入的移民与土著在民族属性与语言文化上存在一定差异。清末东北的移民群体主要以直鲁地区的流民为主，在文化上源于中原的儒家文化，东北地区的文化则以区域性的民族文化为主。移民与土著在民族交往中以同源文化为根基，通过文化教育（主要是义学、书院、学堂教育）、诗文著述、结社讲学等文化交流形式，既交流融合，又保持着各自的相对独立。

晚清东北地区先后创办了很多讲学书院。如沈阳的萃升书院、宁古塔的龙城书院、铁岭的银冈书院等。由于清廷的弛禁政策，大量关内人口迁入东北，东北各地的私塾、讲习所、新式学堂等教学机构增加迅速，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移民群体根据国家的基本制度与经济模式建立起自己的文化社会，并保持着与原籍文化根源的血肉联系。在语言文字方面，清末满语衰微汉语逐渐成为通用语言，移民通过人口基数的优势，加快了对汉语的推广，进一步促进了社会通用语言的发展，为各民族文化交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文化认同是清末东北地区各民族重要的情感认知，这不仅是移民与土著文化共性的内化联结，而且是各民族文化差异的整合与优化。其中，共同性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提和基础，是最为根本的共同性意识。差异性与共同性可以相互依存，但并非平行并列，差异性不能削弱共同性的地位与作用，文化的差异性要服从与服务于文化的共同性。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使得清末东北地区的各民族人口在尊重差异、承认共性的基础之上，挖掘、创新了区域内部的文化交流形式，构建了东北地区新的文化内容，这种文化形式使得移民群体与土著人口对中国文化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有了新的理解。各民族文化

交流交融,使得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创新发
展,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15][P127]}。东北地区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
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深才能叶茂,民族交流
成为促进东北地区各民族文化认同的桥梁与纽带。

(三) 民族交融对东北地区发展的具体影响

民族交融体现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东北
地区产生的具体影响。清代移民进入东北后不仅
面临生存环境的巨大变迁,而且面临自然环境、
耕地面积、垦殖政策、职业选择、谋生手段的多
重压力,生存压力激励着移民群体主动融入迁入
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建设,对
东北地区人口结构的改变、生产技艺的提高、管
理制度的变革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丰富了东北地区的人口构成。1860—
1911年,随着清末社会危机的加剧与移民的大规
模涌入,东北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由封禁时期的
13.39%增长34.03%,人口的死亡率保持在35%,
人口比重从0.91人/平方公里上升到3.73人/平方公
里。嘉庆十七年(1812),东北人口总数为124万
人。宣统三年(1911),东北人口总数1841万人,
其中奉天1102万人,吉林554万人,黑龙江186
万人^{[16][P61]}。据此可知,近代以来移民大量涌入东
北地区,在民族交融中逐渐成为东北人口的重要
组成部分。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
的交往融合,逐步形成了包含满族、汉族、蒙古
族、达斡尔族、锡伯族、朝鲜族、卦尔察族等在
内的多民族共同体,丰富了东北地区的人口结构。

第二,优化了迁入地生产的技艺,促进了各
民族的交往融合。清廷重视农业科技的发展,通
过编撰农书、改进农具、加强水利建设、设立农
业学堂、研制化肥、防治病虫害等方式,提高农
业生产技术与农业产量。晚清《授时通考》《知
本提纲》《农言著实》《泽农要录》《马首农言》
《修齐直指》《金薯传习录》《农蚕经》《豳风广
义》等农业典籍由关内传入东北,这些书籍涉
及了农业种植、灭草除蛹、毒谷杀虫、驱鸭食
蝗等方面,成为指导移民群体与土著人口从事
农业生产的重要依据。在农具改良方面,移民群
体推进了“深耕犁、轘轴、漏锄”等农具的改
良与应用。在灌溉技术方面,移民群体创新了引
河灌田与凿井灌田方式,提高了灌溉速率。同
时,清末东北的移

民群体积极学习关内几种相对特殊的栽培技术,
如小麦的移栽技术、轮墒播种、种谷法、中耕除
草、抗旱保墒、浅耕灭茬、骑垄播种等。在施肥
方面,移民群体根据《知本提纲》中记述的积肥
“酿造十法”,根据土壤的不同情况合理施肥。在
防治病虫害方面,移民群体积极汲取关内防治经
验,通过人工防治、药物防治、农业防治等手段
加强防治工作。

第三,促进了迁入地行政体制的变化。清末
东北地区的民族交融伴随着复杂的合作与斗争,
时而交往、通婚,时而争斗、词讼。加之,东北
地区旗署与民署的事权分散,不能及时解决各
民族人口的现实诉求,这进一步促进了旗民二
元体制的终结。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
谕令嗣后不分旗民,可以相互买卖,正式承认
了旗民交产的合法性。光绪三十三年(1907)
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逐步废除了盛
京、吉林、黑龙江的将军衙门,改设奉天省、
吉林省、黑龙江省。至此,东北地区的将军
管辖制度彻底终结,清廷将盛京将军提升为
东三省总督,东三省总督作为东北最高行政
长官,统辖省内的财政、编审、军备、乡试、
词讼等军政事务,另由府尹、知州、知县等
各级官员负责各民族人口的管理。伴随着晚
清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危机,清代旗民二元的
行政体制已完成了向行省州县体制的过渡。总
之,清廷入关后从八旗制到军府制,再到行
省制,其制度结构的变迁不是一蹴而就的,它
受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兵燹、灾害、
移民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在民族交融的不
同阶段展现出各具特色的发展状况。

清末东北地区的移民与土著受近代社会危
机与移民浪潮的直接影响,具有较强的民族共
同体意识。移民迁入到新的聚居地伴随着民
族交融的深入,构成社会的各种要素也随之
发生深刻变化。各民族群体在重视共性,尊
重差异的基础上,主动融入东北地区的建设
与发展,并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制度变
革、文化建设、民族共同体的培育产生重要
影响。

四、结语

回溯清末东北移民与各民族交往融合
的历史进程,各族人民在互嵌式发展中展
现了清末东北社会变迁的真实面貌。随
着大量移民涌入东北地

区，北部相对封闭的状态被逐渐打破，人口的流动将整个东北地区联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晚清东北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历史和实践证明，清末东北的移民与土著通过迁徙、聚合、互市、通婚、互嵌式居住等方式进行交往交流交融。在晚清的社会变迁中，在移民与土著的互嵌式居住中，在生产方式与婚姻风俗的变化中，在民俗信仰与语言文化的融合中，深化了各民族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次，清末在东北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存在着诸如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这为当代认识民族工作，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现实参考，而对这些矛盾和冲突的了解，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勾勒出一个具有参考性的发展纲要和框架结构。最后，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清末东北各民族群体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实体形式。这为加强各民族互嵌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对构建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家园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条件^[17](P64)]。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2).
- [2] 张萍,齐传杰.十年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综述[J].贵州民族研究,2020,(5).
- [3] 田志和.关于清代东北流民[J].社会科学辑刊,

1983,(5).

- [4] 魏影.清末民初黑龙江移民社会保障述论[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 [5] 梁玉多.试析近代黑龙江流域的移民浪潮与经济发展[J].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5).
- [6] 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7] 李普国.清代东北的封禁与开发[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2,(1).
- [8] 赵英兰.生态环境视域下清代东北地区人口状况解读[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5).
- [9] 吕长全.18世纪山东省的粮食供求与价格研究[D].南开大学,2017.
- [10] 李宗双,范立君.译介学视域下旗人翻译文学钩沉——以顺康年间满译汉文学作品为例[J].黑龙江民族丛刊,2020,(4).
- [11] 滕绍箴.试论明代女真与蒙古的关系[J].民族研究,1983,(4).
- [12] 赵英兰.清代东北人口与群体社会研究[D].吉林大学,2006.
- [13] 袁森坡.清前期北疆政策的渊源与影响[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90,(5).
- [14] 弗·克·阿尔谢尼耶夫.在乌苏里的莽林中[M].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 [15] 李永皇.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及其实现路径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22,(1).
- [16] 胡焕庸.东北地区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前瞻[J].人口学刊,1982,(6).
- [17] 李永皇.贵州实施“双培”行动助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J].贵州民族研究,2023,(2).

(责任编辑:李筱竹)(责任校对:潘光繁 任艳)